

第三章 《莫斯科二〇四二》之 個人崇拜神話主題

在烏托邦體裁小說的情節中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極權統治，尤其在反烏托邦小說與解烏托邦小說中，更是刻意強調這個特點。然而，在極權統治下，「造神運動」是常見的現象，在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小說中，統治者的形象往往被塑造成偉大的天神，供人頂禮膜拜，於是造就出個人崇拜的神話。此外，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小說追尋英雄的特點，也成就了許多個人崇拜的迷思。本章的第一節，將比較《莫斯科二〇四二》中的莫斯科共和國與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兩者造神運動的雷同之處；第二節則要探討《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反共作家嘉年華洛夫的個人崇拜神話，及其與聖徒勝利者喬治(Георгий Победоносец)和索忍尼辛之間的關聯。



第一節 造神運動

壹、造神運動的目的

造神運動的目的，無非是爲了造就個人崇拜的神話，並借此鞏固領袖的政權，獨裁的統治者往往將自己塑造成萬能的神，以博取人民發自內心的景仰與服從，作家徐訏曾說：

「個人崇拜乃是英雄主義的產物。當一個領袖，可以肅清壓抑一切異己的勢力之時，他就必須造成一種偶像性的個人崇拜，這時候，他必須被神化成萬能，變成一個祭司，代表了神，成爲聖經教義最正確的詮釋者，使無人可以變動其領導地位。」¹

這段話道盡了造神運動的原由，但是，前俄共領導人史達林的野心不止於作爲一名傳遞訊息的祭司，他的目標是再造一個上帝²；《莫斯科二〇四二》中的格尼亞里西姆斯同樣也透過造神運動，使其極權統治成爲順天應人的結果。

造神運動的另一個目的，是爲了使人民相信他們置身於烏托邦之中，並借此激發人民的愛國情操。在俄國古典文學時代，詩人們經常在頌詩中將俄羅斯喻爲天堂³，或將沙皇喻爲天神，這些頌詩除了使人民對統治者心悅誠服外，也讓人們以身爲俄羅斯人爲榮，並且更加熱愛祖國。在衛國戰爭期間，史達林的造神運動擁有一個比較切實的目的一增加民族自信、共同抵禦外來的侵略。在這個時期，已被神化的史達林，確實發揮了振奮士氣、穩定民心的功能，使俄國獲得最後的勝利，數以百萬計的俄羅斯士兵，到臨死前嘴裡還喃喃地唸道：「爲了國家及史達林。」⁴然而，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格尼亞里西姆斯的神格化，不僅造成眾人對他盲目地崇拜，並且使得人們忘卻物資匱乏的窘境；人民相信，在格尼亞里西姆斯領導下的莫斯科共和國是個烏托邦，因此，他們多半安分守己，從不埋怨生活的

¹ 徐訏，《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台北：文星，1966，第48頁。

² 據說史達林就讀小學時，校長曾問他：「有些人自從生下來，上帝就不喜歡，你說這該怎麼辦？」史達林回答：「這沒關係，他可以另找一個上帝，或者他重新創造一個上帝。」（周宏偉，《史達林—專橫獨裁的魔鬼大帝》。台北：普全，1995年，第26頁）

³ 參見第二章第二節。

⁴ 亞瑟·史列辛格編，《史達林》。台北：鹿橋，1995，第82頁。

困頓。

貳、造神運動的方式

一、實行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是造神運動的第一步驟，目的是趁兒童及青年學子的思想尚未定型前，向他們肆力地宣揚領導者偉大的人格與輝煌的功績，如此自能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西元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蘇聯當局發布了一項通令，這項通令規定：凡隸屬蘇聯教育委員會的中小學，應立即採取措施，將黨大會的決議與史達林的報告納入課程之中，通令的內容梗概如下：

「黨，以及政治意識形態及組織的問題，將以史達林同志透徹的報告為基礎而構成一切階級的研究中心：在幼年班中，教師的進行方法，是將他加入他的課程之中的片段予以講述……最要緊的是，共產黨的功能，以及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史達林同志的人格，必須要予以強調。」⁵

此外，史達林統治期間，還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幼稚園的孩子們於飯後必須合掌禱告，感謝史達林賜予幸福⁶。蘇聯當局成功地將造神運動植入稚齡孩童的日常生活，養成他們崇拜史達林的習慣，致使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神話，變得牢不可破。

格尼亞里西姆斯統治下的莫斯科共和國，也有類似的思想教育方針：「……在幼稚園裡所上的第一課，即對祖國、黨、教會、國家安全局以及對格尼亞里西姆斯的熱愛。他還必須學會與格尼亞里西姆斯相關的詩句和歌謠……」⁷ 格尼亞里西姆斯與祖國、黨、教會及國家安全局置於同一個平面，這宣示著統治者個人崇高的地位；尤其將格尼亞里西姆斯與教會相提並論，更意味著統治者個人的地位已凌駕於世俗權力之上，他不僅是莫斯科共和國政治上的領袖，也是莫斯科人精神上的領袖，甚至可以說是莫斯科人民信仰的神。

⁵ 拉賓 著，李約 譯，《史達林統治下的蘇俄》。台北：世界，1955年，第279頁。

⁶ 楊默夫 編著，《紅色鋼人一史大林》。台北：克寧，1991年，第170頁。

⁷ 《Москва 2042》，с.204.

二、干預文學創作

爲了加強對文學創作的控制，史達林設立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簡稱「拉普」(РАПП)，這個機構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打著「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旗幟，來誇耀史達林個人的豐功偉業⁸，讓蘇聯的人民更加確信，他們心目中偉大的領袖可以帶領他們擺脫外侮，並將祖國建設成一個烏托邦，這與十八世紀政治頌詩⁹的功能大同小異。一九三六年，高加索詩人史塔斯基(Сталский)在一首獻給史達林的詩中寫道：

「您照管一日的誕生；
清朝的晨星遵從您的意志，
您無比的天才上達九天；
您的深奧及於海底。」¹⁰

同年的八月二十八日，《真理報》(Правда)的編輯在一首獻給史達林的詩中寫道：

「啊！偉大的史達林，啊！人民的領袖，
您給與人類生命，
您使大地沃美，
您使世紀恢復青春，
您給與春天花朵，
您播動和諧之弦，
您，我春天的光輝，啊您，
反映在一百萬顆心田中的太陽。」¹¹

膺有列寧勳章的米哈爾科夫(Михалков)也曾於《真理報》上發表一篇名爲《史達林》的詩作：

「莫斯科沉睡著。在這深夜裡的首都，
在午夜繁星高掛的時刻，
唯有史達林還醒著—
史達林正在思量我們的前途。」¹²

許多作家紛紛以作品讚揚史達林本人與其功績，情形發展到最後，蘇聯國

⁸ 見註 112，第 297 頁。

⁹ 參閱第二章第二節。

¹⁰ 見註 112，第 47 頁。

¹¹ 見註 112，第 49 頁。

¹² Громов Е.С., *Сталин: власть и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8, с.298.

內出版的所有書籍，都必須或多或少提到史達林¹³。蘇聯作家愛倫堡(И.Г. Эренбург)曾寫道：「在數百萬人民的心目中，史達林已經變成一個神話中的半人半神。人們提到他的名諱時，都會不自覺地戰慄起來。大家都相信，他才是能保護蘇聯免於外力侵略，並維持蘇聯國力不墜的唯一人物。」¹⁴

《莫斯科二〇四二》中的莫斯科共和國，對於文學創作，亦採取全面控制的策略，所有共產主義作家協會的成員，必須遵照格尼亞里西姆斯個人的指示從事創作，所有的文學作品，只有一個主題，就是歌頌格尼亞里西姆斯：

「我們這裡沒有所謂流行的體裁，或不流行的體裁。人們會在任何體裁中，描寫我們最引以為傲的、最愛戴的，也是全民所珍視的格尼亞里西姆斯。」¹⁵

「—難道你們這裡沒有兒童作家或青少年作家嗎？

—當然有，兒童作家描寫格尼亞里西姆斯的童年時代，青少年作家描寫格尼亞里西姆斯的青少年時期，而成人作家，則描寫他的成年階段。」¹⁶

「他們擁有完全的創作自由。……每一個共產主義作家，都能夠自由地描寫自己對格尼亞里西姆斯的熱愛。他們可以自由地描繪，在格尼亞里西姆斯的領導之下，自然界有多麼偉大的變化。」¹⁷

由以上三段敘述可以看出，雖然莫斯科共和國當局強調文學的創作自由，但是，實際上則一點創作的自由也沒有，所有作品的中心思想，都是在讚嘆領袖的偉大，文學的存在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配合當局的造神運動。此外，從第二段敘述中，還可以發現格尼亞里西姆斯著實被徹底地神格化了，從他的童年時期、青少年時期，一直到成年階段，都被作家們當成謳歌的對象。

三、宣傳

¹³ 見註 111，第 100 頁。

¹⁴ 見註 111，第 101 頁。

¹⁵ 《Москва 2042》,с.208.

¹⁶ 《Москва 2042》,с.209.

¹⁷ 《Москва 2042》,сс.208~209.

(一)控制媒體

媒體是傳遞訊息的工具，其型態十分廣泛，舉凡報紙、電台、電視、電影、雜誌等能迅速且廣泛地傳播消息者，都屬於它的範疇¹⁸，因此，若能控制媒體，便能間接控制人們的思想。由於史達林與格尼亞里西姆斯都能有效地掌控媒體，因而得以成就他們的個人崇拜神話。

一九五〇年，《真理報》上刊登了一篇關於史達林的文章，其內容概要如下：

「如果你在工作時遭遇困難，抑或突然對自己的能力起了懷疑，不妨想想他一史達林吧！你將會因此而找回自己所需要的信心。如果你在不應該疲憊的時刻感到疲憊，想想他一史達林吧！你的工作將因此而順利進行。如果你希望做一個正確的決定，想想他一史達林吧！你就可以找到這樣的決定……史達林說的話就是人民所想的事，人民說的話則是史達林想的事。」¹⁹

這篇文章正好呼應了一九三七年，赫魯雪夫(Н.С.Хрущев)向蘇共黨員發表的一段談話：

「史達林是我們的希望。史達林是我們的期待。史達林是指引所有上進人民前進的燈塔。史達林是我們的標竿。史達林是我們的願望。史達林更是我們的勝利。」²⁰

史達林所使用的每一種範式，甚至每一句話，都可能立即衍生為一個口號，進而被刊登在各大報上，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史達林宣稱：「我們有機器，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是人。」²¹此話一出，次日的《真理報》便指出：「我們深切地感覺到史達林同志這一『幹部決定一切』新口號的巨大重要性，我們鄭重誓約奮鬥工作，使我們值得偉大領袖的關注與愛顧……。」²²在當時，史達林的登高一呼，猶如天降神諭，所有國內媒體都必須扮演起祭司的角色，將其口諭傳達給全國人民，甚至使它變成廣為流傳的口號。

¹⁸ 高永健，〈史達林極權政治之研究〉，碩士論文，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1991年，第113頁。

¹⁹ 見註111，第102頁。

²⁰ 見註111，第71頁。

²¹ 見註112，第45頁。

²² 見註112，第45頁。

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莫斯科共和國的媒體同樣肩負著造神的任務。電視頻道每日都要播送許多關於格尼亞里西姆斯的正面報導。此外，每天早晨都必須宣讀一份關於領袖健康狀況的會報，每日的會報中，從不透露格尼亞里西姆斯的年事，只千篇一律地強調他的健康狀況良好：

「每日早晨，莫斯科共和國的電訊播報員謝苗諾夫與瑪利亞維娜，會透過十二個頻道，鄭重地宣讀格尼亞里西姆斯的健康會報：脈搏的跳動十分規律，肝功能的運作非常良好，尿液與血液的檢驗也都完全符合健康標準。」²³

關於領導者的年齡，共和國當局不願據實以告，但是，每日都會向人們發布以上的公報，企圖給社會大眾製造一種印象——格尼亞里西姆斯是永生不死的。

(二)樹立肖像

樹立肖像是造神運動常見的手法，目的是供人隨時瞻仰，並且讓人永誌不忘。在蘇聯當局瘋狂造神的年代裡，史達林的肖像，走進了千家萬戶，供人們去頂禮膜拜，所有的人，尤其是蘇聯晚一輩的人物，皆以能親眼一見領袖的風儀為榮²⁴。所有的公共場合都掛有史達林的肖像，連最崇高的山嶺上²⁵與最偏遠的森林裡，也都樹立著他的銅像；一九五一年，史達林下令在窩瓦河和頓河之間的運河上，建造一座自己的巨大銅像，這座銅像總共使用了三十三噸黃銅，高度更達三十六呎²⁶。史達林的巨幅肖像高掛在所有建築物的牆上，無數的小型肖像，則懸掛在全國各處的民宅和辦公室裡，光是莫斯科的喀山車站內，就有一百五十一個史達林的雕像與肖像²⁷。因此，即便是對蘇聯政權具有好感的人士，也認為蘇聯境內的史達林肖像實在過於氾濫，弗里曼(Friedmann)曾經表示：

「我時常在公園與花園中，看到以不同色彩枝葉的植物靈巧製成的史達林像。我在療養院中、托兒所裡、汽船上，以及農人旅行所乘車輛的車壁上看到他的照片。我甚至也曾在一所醫院中看到過，那一

²³ 《Москва 2042》,c.189.

²⁴ 周宏偉，《史達林——專橫獨裁的魔鬼大帝》。台北：普全，1995年，第332頁。

²⁵ 在帕米爾高原的史達林峰上，矗立著一座史達林的半身雕像。

²⁶ 見註111，第101頁。

²⁷ 見註113，第170頁。

所醫院是治療痴呆兒童的。」²⁸

電影院中，螢幕的兩側一概以燈光打出史達林和列寧的肖像²⁹，在影片放映時，總會不時地插播史達林的影像；學生們打開筆記本時，會在內頁看見史達林的照片。此外，史達林的肖像會被印製成明信片出售，或者被畫在石頭上、花瓶上、吊燈上，甚至是截紙刀上，猶如一種新式聖像般，被供奉在蘇聯人民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的《真理報》中寫道：

「我們有以萬千計的領袖畫像、凸雕，以及雕像。他的名字被重複千萬遍，有時見於金屬上，有時見於如空氣一般輕細透明的紗上，有時是由菊花、玫瑰、延命菊配成的。」³⁰

在莫斯科共和國中，格尼亞里西姆斯的肖像同樣也四處林立。當敘事者剛抵達公元二〇四二年的莫斯科時，列隊歡迎的群眾手中，便高舉著格尼亞里西姆斯的畫像：「我一步出機場，音樂立刻響起，並且有大批民眾一齊揮舞著手中的旗幟、標語，以及格尼亞里西姆斯的畫像……。」³¹不僅如此，在莫斯科共和國內，舉凡各大廣場、各個公共場所，更是隨處可見格尼亞里西姆斯的肖像：

「在紅場上，沒有聖瓦西里大教堂，沒有列寧墓……只有國營百貨商店、歷史博物館、刑場，以及格尼亞里西姆斯的雕像……。」³²

「我從旅館的窗戶望出去，見到在大劇院前，也佇立著令我感興趣的格尼亞里西姆斯像，我朝那個方向走去，打算到大劇院那兒。」³³

「……過去的普希金廣場，如今稱為文學天才格尼亞里西姆斯廣場，而矗立在廣場上的紀念像，當然，也不再是普希金像，而是格尼亞里西姆斯的雕像。」³⁴

²⁸ 見註 112，第 53 頁。

²⁹ 見註 111，第 101 頁。

³⁰ 見註 112，第 53 頁。

³¹ 《Москва 2042》,c.121.

³² 《Москва 2042》,c.165.

³³ 《Москва 2042》,c.166.

³⁴ 《Москва 2042》,c.167.

莫斯科共和國的學童，甚至必須牢記領袖雕像的數目；敘事者見到一名教師帶領著一批學生，在雕像前作戶外教學，並且有以下一段對話：

「— ……伊凡諾夫，全莫斯科共有幾座格尼亞里西姆斯的雕像？

— 一百八十四座。— 伊凡諾夫高喊道。

— 完全正確！有一百八十四座。而第一百八十五座，現在正於名為格尼亞里西姆斯的列寧山上建造……。」³⁵

此外，無論是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或是格尼亞里西姆斯領導下的莫斯科共和國，都常以領袖的名字來替境內的山川、城市命名，例如：史達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史達林斯克(Сталинск)、史達林峰(Сталинская вершина)等，以領導人名諱命名的廣場、街道更是不計其數，例如：格尼亞里西姆斯街(Улица имени Гениалиссимуса)、文學天才格尼亞里西姆斯廣場(Площадь имен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Дарований Гениалиссимуса)等；如此便能達到與樹立肖像相同的成效：使人們將領袖的名字銘記於心，這種現象近乎於信徒對神祇的緬懷，為造神運動的宗旨。

³⁵ 《Москва 2042》,с.168.

第二節 嘉年華洛夫的個人崇拜神話

《莫斯科二〇四二》中，除莫斯科共和國執政當局為加強極權統治，所創造的領袖崇拜神話外，還存在另一種救世英雄式的個人崇拜神話。這一小節便要探討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反共作家嘉年華洛夫救世英雄式的個人崇拜神話。

壹、嘉年華洛夫與勝利者喬治

一、勝利者喬治的生平事蹟與象徵意義

勝利者喬治(或稱聖喬治(Святой Георгий))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神聖殉道者。聖喬治生長於今日土耳其一帶的基督教家庭，其父因對基督教的虔誠信仰，而遭受迫害。聖喬治曾於軍中任職，官拜羅馬司令官，在職期間，因其勇氣過人而馳名遠近。宗教迫害³⁶盛行時期，戴克里安皇帝(Диоклетиан)曾企圖遊說聖喬治放棄其信仰，但遊說未果，戴克里安便令戰士以長矛弑之，但是，當長矛觸及他的軀體時，鐵製的矛鋒竟然變得柔軟而彎曲了；於是，皇帝下令將他囚禁於監牢中。身陷囹圄的聖喬治胸前被繫上巨石，並被網綁於齒輪上，齒輪重傷了他的身軀，但不久後，他的傷痕竟不藥而癒，連續兩次的奇蹟，雖讓聖喬治死裡逃生，但最後戴克里安皇帝仍下令將他斬首。

勝利者喬治在獄中的遺願：希望遺體能葬於巴勒斯坦(Палестина)，但在他過世後，遺體卻被葬於羅馬。康士坦丁沙皇(Царь Константин)在位期間，於利達(Лида)興建了一座以殉道者為名的教堂，並將聖喬治的遺體移葬於這座教堂中。不久後，在距離利達不遠的貝魯特(Бейрут)，發生了一樁奇蹟。在貝魯特的一處湖泊中，出現一條惡龍，惡龍殺害了許多當地居民，當地居民每日還必須獻上一名自己的子女給惡龍。有一回當惡龍正要擄走公主之際，勝利者喬治騎著白馬，從湖中躍出，隨即以長矛襲擊惡龍的咽喉，並驅策白馬蹙之，聖喬治囑咐公主將惡龍引進城裡。到了城裡，

³⁶ 基督教剛開始時，只是地中海東岸的少數教派，後由傳教士推展至羅馬。基督教在公元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受洗成為基督徒前，一直備受迫害。公元三〇三年，戴克里安皇帝發動了一場羅馬帝國政府最大的宗教迫害行動。

聖喬治以長劍屠殺惡龍，居民隨即將惡龍屍首焚毀，事後居民們以聖母與聖喬治之名，在當地興建一座大教堂。勝利者喬治是許多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神話、傳說與歌謠中的英雄人物，其屠龍事蹟在十字軍東征³⁷期間流傳甚廣，據說他曾披著白色斗篷，帶著紅色十字架，參與一〇九九年的十字軍東征戰役³⁸，使十字軍成功地奪回耶路撒冷。

在基督教中，勝利者喬治騎乘的白馬，為勝利的象徵。《啓示錄》第六章第一節至第二節關於「七印」³⁹之第一印的敘述如下：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第一印中的白馬與騎士，代表戰爭得勝的景況。從前，每當羅馬將軍自戰場凱旋歸來，便會乘坐白色駿馬所拉行的戰車，《啓示錄》借此景象，作為「七印」之首，並特別標示出「勝了又勝」⁴⁰。此外，在羅馬時代還有一個關於白馬的傳說，據說羅馬帝國始終有一無法收拾的勁敵，即帕飛亞王朝(Parthian)，她位於羅馬帝國東方最遙遠的邊陲上，羅馬人稱之為沒有文化的蠻荒之地；西元六二年，雙方交戰，羅馬的一支勁旅，竟向帕飛亞王窩老吉斯(Vologeses)投降，而帕飛亞王朝軍隊所騎乘的正是白色駿馬。因而白馬在基督教神話中，為勝利的象徵。

二、《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勝利者喬治形象之體現

在俄羅斯，聖喬治又名尤里(Юрий)或耶果利(Егорий)，他被斯拉夫人視為農牧業的守護者。自十四世紀開始，這名白馬騎士的形象成為莫斯科的標誌，爾後，更成了俄羅斯帝國的國徽。不僅如此，在俄國的許多徽章與旗幟上，也都標誌著勝利者喬治的圖像；古俄時期的畫作與雕刻作品，也經常以聖喬治屠龍為題材，具有光明永遠凌駕於黑暗之上，與邪不勝正

³⁷ 公元一〇九五年，教宗烏爾班二世發表了一篇宗教演說，鼓吹西方的領袖們，從土耳其回教徒的手中，取回聖城耶路撒冷；從而展開數次名為十字軍東征的戰役。

³⁸ 十字軍東征有四次主要的戰役：第一次東征戰役於一〇九六年至一〇九九年，第二次東征戰役於一一四七年至一一四九年，第三次東征戰役於一一八九年至一一九二年，第四次東征戰役於一二〇二年至一二〇四年。

³⁹ 「七」這個數字，在《啓示錄》中象徵著完全的意義；《啓示錄》中的「七印」、「七號」與「七碗」都代表著完全的災難。

⁴⁰ 楊牧谷，《末世戰馬》。香港：天道，2001年，第12頁。

的象徵意含。在這些徽章、旗幟與藝術作品中，勝利者喬治多半以騎乘白馬、身著戰袍、手持長矛的姿態出現。除此之外，勝利者喬治的精神形象也常見於俄國文學作品中，例如，巴斯特納克(Б.Л.Пастернак)的《齊瓦哥醫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⁴¹；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勝利者喬治的形象體現於大作家嘉年華洛夫身上。

(一)勝利者喬治形象的體現

《莫斯科二〇四二》以敘事者與友人盧迪(Руди)的談話拉開序幕。身為馬場主人的盧迪對敘事者提起了白馬，他說有人委託他將純種的白馬運送至加拿大繁殖，盧迪還特別強調：「全世界育有許多馬，牠們被稱為白色的馬，……而真正的白馬，全世界只有在法國的羅納河河口處才出產。」⁴²兩人的對話為《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勝利者喬治的形象埋下了伏筆：盧迪因受人之託，將純種白馬運往加拿大繁殖，因此，流亡加拿大的嘉年華洛夫，方能騎乘真正的白馬返回莫斯科。

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之〈基督再臨〉(Второе пришествие)一節中，關於嘉年華洛夫重返莫斯科的景象敘述如下：

「我踮起腳尖，一開始我只能看出類似長矛尖端的物體，然後，當我再擠向前一點時，我看見三位勇士，正緩慢地朝著凱旋門邁進。中間那位騎著白馬，身著飄揚著的白色衣物、腳踏白色馬靴的，正是辛·辛梅契·嘉年華洛夫，而在他兩旁，顛簸在棕色馬背上的，右邊為季里別洛維奇，左邊則是湯姆，兩人皆蓄長鬚，儘管天氣如此炎熱，他們仍然頭戴羊毛帽，此外，兩人都佩帶著長矛。」⁴³

白馬騎士的圖像，向來是莫斯科的標誌，嘉年華洛夫騎著純種的白馬回莫斯科，猶如勝利者喬治再現。另外，《莫斯科二〇四二》強調嘉年華洛夫的白馬具有純正血統，這暗示著他以正統自居，並自許為莫斯科真正的守護者。

(二)屠龍事蹟的體現

⁴¹ 參閱 Сендерович С.Я., *Георгий Победоносец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Масква: Аграф, 2002.

⁴² 《Москва 2042》, с.12.

⁴³ 《Москва 2042》, сс.347~348.

除了勝利者喬治的形貌外，其屠龍事蹟同樣也體現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嘉年華洛夫重返莫斯科的首要任務，便是徹底剷除共產主義：

「—我們這位全俄羅斯的專制沙皇謝拉菲⁴⁴，大仁至聖地向各位宣布，共產主義已經完全被消滅，不會再出現了，在場的各位之中，是否有隱匿的共黨份子？

……

—有！—德杰爾金大喊，並且潛入人群之中，將卡穆尼·伊凡諾維奇拖出。……

—你可承認自己曾像條狗一般地為嗜血的共產黨與其魔鬼般的教義效命？

—陛下，我承認—卡穆尼·伊凡諾維奇低下頭，吱吱唔唔地說道，

……

—將他釘在十字架上一沙皇命令道。」⁴⁵

嘉年華洛夫自認為背負著解救世人脫離共產主義統治的重責大任，因此，他必須消滅所有共產黨的殘餘勢力。對他而言，共產主義猶如殘害眾生的惡龍，因此，他必須效法聖喬治屠龍的精神，將其一舉殲滅。

貳、嘉年華洛夫與索忍尼辛

《莫斯科二〇四二》自一九八六年出版後，即引發不少爭議。許多人認為作者刻意以辛·辛梅契·嘉年華洛夫影射索忍尼辛，並刻意將其醜化，沃伊諾維奇也因此遭受僑民界作家的排擠⁴⁶。但作者本人則否認這樣的指控，他曾多次公開聲明，《莫斯科二〇四二》所描寫的是嘉年華洛夫，而非索忍尼辛⁴⁷。但不可否認的是，嘉年華洛夫的身世、好惡和際遇確實與索忍尼辛有諸多雷同之處。這一部分將就兩人的外在形象、人生際遇、作品特色、思想理念與他們所造就的個人崇拜神話，作一比較分析。

一、外在形象

嘉年華洛夫身材高大而佝僂，面頰凹陷，並且堅持留著大鬍子：

⁴⁴ 謝拉菲(Серафим)為嘉年華洛夫的化名。“Серафим”為基督教神話中的六翼天使。

⁴⁵ 《Москва 2042》,сс.348~349.

⁴⁶ 同註 97。

⁴⁷ Войнович В.,*Портрет на фоне мифа*.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2,с.5.

「一開始，嘉年華洛夫的鬍子實在是長得離譜，當他快步走時，偶爾還會被自己的鬍子絆倒。……於是，他把鬍子減短，此後鬍子的長度就只能勉強遮住膝蓋。」⁴⁸

敘事者認為，嘉年華洛夫堅持蓄鬍其來有自，因為鬍鬚是先知的表徵，先知的地位是藉由鬍鬚成就的：

「無論是前衛思想的傳佈，或是社會意識的領導，鬍子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馬克思剃了鬍子，馬克思主義就無法征服群眾的心；如果列寧剃了鬍子，就無法領導成功的革命。……一個沒有鬍子的人，是無法成為先知的。」⁴⁹

索忍尼辛也始終堅持蓄鬍，甚至因此招致《新世界》雜誌(Новый мир)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А.Т.Твардовский)的不滿，主編曾多次數落他的大鬍子：「您的鬍子已經不再是海明威式的了，更像是杜勃羅留波夫式了。」⁵⁰不僅如此，主編甚至還當面質問索忍尼辛蓄鬍的用意何在：「為什麼總是留著一臉長鬍子？是不是為了偷越國境方便？」⁵¹當他得知索忍尼辛將稿件交給《真理報》時，在責難的言詞中，也不忘提及索忍尼辛的鬍子：

「怎麼可以隨隨便便地就把稿子撤走呢？怎麼可以把《小品集》偷偷摸摸地交給《家庭與學校》雜誌呢？又怎麼可以把控告信寄給了中央書記處的幾位書記，而不給杰米切夫呢？還有，怎麼可以還留那麼長的鬍子呢？又是鬍子！……」⁵²

一九六五年，當索忍尼辛謁見蘇聯中央主管文化及宣傳工作的領導人之前，《新世界》的編輯也建議他應該先將臉上的大鬍子剃掉⁵³。索忍尼辛初出茅廬時，曾有許多人建議他剃鬍，但在他成名之後，一臉的大鬍子反而成為他的標誌，甚至有人直接以「佛蒙特大鬍子」⁵⁴稱之。

二、人生際遇

(一)身世

⁴⁸ 《Москва 2042》, с. 62.

⁴⁹ 《Москва 2042》, сс. 61~62.

⁵⁰ 張曉強，《索爾仁尼琴—回歸故里的流亡者》。長春：長春，1996年，第54頁。

⁵¹ 見註157，第53頁。

⁵² 見註157，第60頁。

⁵³ 見註157，第45頁。

⁵⁴ 索忍尼辛流亡期間，曾僑居於美國佛蒙特州。

嘉年華洛夫自幼便失去父親，由母親撫養長大：「這個孩子的父親被囚禁在監牢中，母親則身兼父職……。」⁵⁵有一天，出現一名神秘的老人，他預言嘉年華洛夫將成爲俄國的沙皇：

「老人向他要水，喝完後，他將鬍鬚上沾到的水滴擦乾，然後，仔細地打量著嘉年華洛夫，並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辛。—辛回答道。老人接著說：

—這就對了，辛。……我告訴你，你將成爲俄羅斯的沙皇，你將成爲辛一世。」⁵⁶

事後，年幼的嘉年華洛夫將整件事的始末告知母親，母親認爲兒子的身世再也隱瞞不住，終於向他吐露真相：

「就在那一夜，母親取得他的誓言後，揭開了他的身世之謎。……這個秘密就是，辛·格列貝奇·嘉年華洛夫根本不是辛·辛梅契的親生父親，他的親生父親是尼古拉·亞歷山大洛維奇·羅曼諾夫，也就是全俄羅斯的專制沙皇。」⁵⁷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的父親伊薩基·謝苗諾維奇(Исай Семёнович)，在兒子出生前六個月便去世了，索忍尼辛由母親獨立撫養。母親在中學擔任教職，同時也兼做打字、速記等各項雜活，她爲了讓孩子健康成長，不受欺負，終生沒有再嫁。索忍尼辛五歲時，母親帶著他遷居羅斯托夫州首府頓河羅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據說遷居的目的有二：一是爲了找工作糊口，另一個目的則爲了隱瞞其夫爲白軍軍官的身分；在當時「軍官」一詞幾乎是「反革命」的同義詞，因此，索忍尼辛的母親深怕身分曝光會給母子倆帶來災禍⁵⁸。

(二)經歷

嘉年華洛夫成爲知名作家前，曾經是集中營裡的政治犯；獲釋後致力於寫作，同時在幼稚園擔任燒爐工人以維持生計，並堅持過著克勤克儉又極爲封閉的生活：

⁵⁵ 《Москва 2042》,с.250.

⁵⁶ 《Москва 2042》,с.251.

⁵⁷ 《Москва 2042》,с.252.

⁵⁸ 李毓榛 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2000年，第385頁。

「辛·辛梅契做著月薪六十盧布的工作，過著禁慾的生活；他不喝酒、不抽煙，以非常粗糙的食物維生。他從早到晚都在寫作，不曾放任自己，也不與人往來，他這麼做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他怕有告密者；第二，他十分珍惜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⁵⁹

「在這間地下室的房間裡，住著一名新崛起的天才，也就是季里別洛維奇的偶像(指嘉年華洛夫)。房間大概只有七、八坪，牆上的綠色壁紙，有部分已剝落，有部分則因受潮而凸起。房間的天花板上有一個以柵欄圍著的小窗子，感覺像是一間囚房。房間裡的擺設很簡陋：一張生鏽的鐵床，上面覆蓋著粗糙的呢絨布，以及一張沒有上漆的餐桌……。」⁶⁰

嘉年華洛夫的作品一直無法順利地在蘇聯境內發表，因為當局認為他的作品及言論，對國家的穩定產生威脅：

「很可惜，現在不是你的小說出版的時機。我們很歡迎你的小說在別的時候出版，但是，當下的國際情勢十分複雜，我們的敵人正企圖利用你的小說對我們不利。」⁶¹

但嘉年華洛夫依然公開發表自己的信念，並將作品送至國外出版，於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下令將他逮捕，不久後又將他驅逐出境。

索忍尼辛與嘉年華洛夫的經歷極其相似。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次大戰終戰在即，索忍尼辛一封批評史達林的信件被當局查扣，旋即被以從事反共宣傳、建立反共組織之罪名逮捕，自此，開始了他長達十餘年的監獄、集中營與流放的生活。一九五七年，結束流放生活後，定居於利亞桑(Рязань)，從事秘密寫作，並倚靠在中學擔任教員的微薄薪水度日。

關於索忍尼辛在利亞桑的生活，他的回憶錄《牛犢撞橡樹》(Бодался телёнок с дубом)中提到：

「在利亞桑，我必須想盡方法來加強生活的安全。我剛到利亞桑時，既無熟人，也無朋友；既不請客，也不作客。說一個整年、整月，

⁵⁹ 《Москва 2042》,сс.46~47.

⁶⁰ 《Москва 2042》,с.52.

⁶¹ 《Москва 2042》,с.57.

甚至連假期都沒有空閒的時間，誰會相信呢？我因為不能讓家裡的隱密有一點點的外洩，所以就不能讓任何的陌生人闖進家裡來。」⁶²此外，他在利亞桑時，從未浪費一分鐘⁶³，他的回憶錄中提到：「在沒有閒暇的條件下，或者在沒有寧靜的時候，我都能工作得很好、很緊湊。」⁶⁴

一九六二年的蘇聯，正值赫魯雪夫進行反史達林運動的年代，索忍尼辛的《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Денисовича)被認為是抨擊史達林制度的利器，因此得以順利出版。但是，接下來的幾部作品都未能符合國內出版標準，於是他不得不將作品送至國外出版，此舉引發蘇聯當局極度的不滿，一九七四年二月，索忍尼辛遭驅逐出境。

三、作品特色

嘉年華洛夫的作品篇幅都非常大，季里別洛維奇讚嘆他的作品氣勢磅礴，並且將他譽為新托爾斯泰(Новый Толстой)及新達文西(Новый да Винчи)：

「我問季里別洛維奇，這位新托爾斯泰要為自己的作品取什麼名字。

他很得意地回答說這部八百六十頁的作品命名為《КПЗ》。

—《КПЗ》？是關於民警的作品嗎？

—為什麼是關於民警的作品？—季里別洛維奇不解。

—КПЗ 指的不是拘禁室嗎？

—嗯，當然是啊，但這部小說並不是關於民警的。這不單是一部小說而已，它是辛·辛梅契計畫寫的六十部小說其中之一。」⁶⁵

「……他又開始絮絮叨叨地談起他那位奇才，他竟然說嘉年華洛夫不只是新托爾斯泰，還是新達文西。他是一個天賦異稟的人，他的作品並非以一冊或一卷來計算，而是以串計算。」⁶⁶

由於嘉年華洛夫曾長年在集中營服役，因此，他的小說幾乎都在描寫集中營的生活：

⁶² 王兆徽 譯，《索忍尼辛回憶錄》。台北：中華日報，1976年，第8頁。

⁶³ 拉培茲 著，張平男 等譯，《索忍尼辛創作歷程》。台北：長青，1974年，第10頁。

⁶⁴ 見註169，第9頁。

⁶⁵ 《Москва 2042》，сс.48~49.

⁶⁶ 《Москва 2042》，с.49.

「季里別洛維奇向我解釋說，《遼闊地帶》是整部史詩的標題。

—也就是說，這又是一部關於集中營的作品？—我問。

—傻瓜，集中營不過是個狹小的地帶罷了。但是，狹小地帶也將是遼闊地帶的一部分。

—我懂了，那麼《КПЗ》就是狹小地帶的一部分，對吧？」⁶⁷

一九七〇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索忍尼辛，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的作品題材不算廣泛，但體裁十分多樣化。題材方面，主要是描寫監獄、集中營、流放地、病房、戰爭與革命；其中，描寫集中營的作品反應最熱烈，例如：《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島》(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等。體裁方面，則包含小說、史詩、隨筆、詩體散文、政論、敘事長詩、戲劇等。以小說篇幅而論，索忍尼辛有許多長篇巨著，他的作品如《古拉格群島》、《癌症病房》(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地獄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等，都是七百頁以上的巨著。

許多人將索忍尼辛與托爾斯泰相提並論。這兩位作家的作品，都寓含濃厚的說教意味；索忍尼辛的作品幾乎都在揭發真相，並向世人曉以大義；托爾斯泰的作品則自一八八〇年後，也多半帶有教育大眾的目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稱索忍尼辛的小說，與托爾斯泰的道德說教作品有共同之處⁶⁸。此外，索忍尼辛的《一九一四年八月》(Авгус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是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歷史小說，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都是反應一個動盪時代的巨著，因此，兩部作品常被拿來互相比較。

四、思想理念

(一)道德思想

嘉年華洛夫一向主張人類應該過著儉樸的生活，無論是任何身分地位的人，都應該謹守這個原則，他在記者會上談到：

「首先，你們應該捨棄一切多餘的東西。每個人只應該擁有自己最需

⁶⁷ 《Москва 2042》,с.49.

⁶⁸ 見註 157，第 15 頁。

要的東西即可。你們看看我，一個舉世聞名的作家，但我仍然過著儉樸的生活。我只擁有一棟房子、兩幢小別墅、一所澡堂、一間馬廄以及一座小教堂。」⁶⁹

索忍尼辛是虔誠的東正教教徒，他的道德觀深受其信仰的影響。東正教是基督教中思想較為清純，信仰較為堅定的一個教派，教徒們將聖經條文奉為生活的圭臬，因此，他們的生活以簡單樸素為原則；因而索忍尼辛也提倡人類應該過儉樸的生活。一九八二年十月，索忍尼辛訪台，耿榮水談到他訪台期間的儉樸生活：「他不愛排場，不喜歡無謂的應酬，每天只吃兩餐，中餐僅以牛奶和幾片麵包裹腹，過著類似清教徒的生活。」⁷⁰索忍尼辛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到：

「特瓦爾多夫斯基是共產黨的忠實信徒，他不能不裝聾作啞，用隱瞞消息來作為自衛的手法。於是，他就不得不避重就輕地對西方記者們說，我做人很謙遜(這點是他最賞識的)，我的行為有如修道院的苦行僧一般。」⁷¹

(二)宗教與民族思想

嘉年華洛夫流亡期間，每晚必須研讀《達爾辭典》(словарь Даля)及聆聽巴哈聖樂：「他現在正在研究《達爾辭典》，接著要欣賞巴哈(Бах)的音樂，他在睡前總是得聽聽巴哈的音樂，沒有巴哈，他無法入睡。」⁷²素有「音樂之父」之稱的巴哈，以他的每一個音符來榮耀耶穌基督，因而改變了西方樂壇的創作模式。嘉年華洛夫醉心於巴哈的聖樂，象徵著他對基督教的虔誠信仰。此外，嘉年華洛夫孜孜不倦地研讀的《達爾辭典》，是集俄羅斯人民生活用語大全的代表作，嘉年華洛夫反對使用外來語，他所使用的語彙帶有濃厚的俄國色彩，例如：гляделка(電視)、леталка(飛機)、читалка(報紙)，這顯示出他對俄羅斯傳統的孺慕之情。然而，捍衛東正教信仰與俄羅斯語言的「純粹性」，也正是索忍尼辛畢生的志業。

(三)政治理念

⁶⁹ 《Москва 2042》,с.83.

⁷⁰ 吳豐山等編著，《索忍尼辛及其訪華始末》。台北：自立晚報，1982年，第143頁。

⁷¹ 見註169，第130頁。

⁷² 《Москва 2042》,с.72.

嘉年華洛夫反對共產體制，他曾在國際記者會上大肆抨擊共產主義：「他在外國記者面前，以非常犀利的言詞批判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者，他有時稱共產主義者為嗜血的共產主義者，有時就直接稱他們為嗜血者。」⁷³ 嘉年華洛夫除了反共，他也反對多元化的社會，他認為群眾必須服從一個強而有力的領袖，他說道：「多元論者比那些嗜血的共產主義者更糟糕。……拿鵝群來比喻，牠們該往哪兒飛，總是由領袖帶頭；如果牠們沒有領袖，而是一群多元主義者，那麼牠們會到處亂飛，然後全部死亡。」⁷⁴

索忍尼辛以「反共作家」的稱號享譽全球，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這位反共作家在紐約市公開演說，演說詞中提到：

「難道我們事先就不能估量共產主義要吞噬整個世界的威脅嗎？我個人就曾被吞噬過，曾經一度被吞在那惡龍腹中，在那條惡龍火熱的腹中。……我到諸位這裡來，就是以目擊證人的身分，來說明惡龍腹中的真實情形。」⁷⁵

除了對共產主義的批判，索忍尼辛也認為，當時西方的民主國家正走向毀滅之路：

「西方的各個民主國家都具有其獨特的國家目標，而這些國家目標皆超越於共同的世界目標；當國家目標與世界目標不能兼顧時，便犧牲後者以成全前者，結果使得民主國家的團結鬆動，很容易被敵人分化離間，然後一一擊破。」⁷⁶

此外，他還在一九八二年發表一篇名為〈我們的多元主義者〉(Наши плюралисты)的文章，諷刺西方世界崇尚多元主義的現象。

五、個人崇拜神話

嘉年華洛夫將共產主義視為殘害世人的惡龍，並以屠龍英雄自居，誓言將共產主義完全殲滅；索忍尼辛在演說詞中，也將共產主義比喻為惡龍，並諄諄告誡西方各國，不可落入共產國家所設的陷阱。無論是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或是在現實世界裡，這兩位反共作家都以先知與救世英雄的形象，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形成個人崇拜的神話。

⁷³ 《Москва 2042》,с.57.

⁷⁴ 《Москва 2042》,с.60.

⁷⁵ 劉孚坤 等編，《索忍尼辛的震撼》。台北：先知，1976年，第115頁。

⁷⁶ 見註182，第248頁。

《莫斯科二〇四二》的敘事者意外地在公元二〇四二年的莫斯科共和國見到嘉年華洛夫的名字，並得知他仍然深具影響力：

「我望著那一捆電線，突然發現在那些電線上寫著大大的字，這個字是我早已見過的一「辛」。我問希羅馬亨，「辛」是什麼意思。……
—難道你以前沒見過這個字嗎？—德杰爾金帶著一種狡猾的神情問道。……

—見過，我認識一個作家，他的名字就叫辛。但我想這跟他應該沒關係……因為這裡沒人認識這個作家。—我說。

—您真的這麼想嗎？……如果我說在我們這裡，所有人都認識您這位叫作辛的朋友，甚至有許多人讀過他的作品，他的這些支持者被稱為「辛主義者」，你相信嗎？—德杰爾金說。」⁷⁷

嘉年華洛夫的名氣與影響力並不僅止於此，就連在第一圈(Первое Кольцо)中，也有許多他的支持者；而莫斯科共和國裡「辛主義者」更是遠多於馬克思主義者，這些支持者甚至積極地成立許多以辛為名的組織：「接著出現一個由中小學生成立的地下組織，這個組織的名稱就叫作「辛」。之後，人們就不再以嘉年華洛夫之名作為組織的名稱，而是使用「辛」這個字來代替。」⁷⁸

當莫斯科共和國瓦解之際，嘉年華洛夫返回莫斯科，受到全國人民熱烈歡迎，以下是人們準備迎接嘉年華洛夫歸國的一段敘述：

「成千上萬的民眾興奮地守在凱旋門旁，……人們撕下所有格尼亞里西姆斯的肖像與箴言；這些肖像與箴言到處亂飛，飛到了人群裡，被人們撕成碎屑。就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有一群年輕人，他們環繞著起火的格尼亞里西姆斯人像手舞足蹈。……

—你看，這些全是「辛主義者」。—德杰爾金指著人群說道。」⁷⁹

本節稍早曾經提到，嘉年華洛夫自許為莫斯科的守護者，並且以勝利者喬治的形象自我加持。不僅如此，他還將自己的思想與理念變成一種「主義」，並吸納大批的追隨者，成功地創造出個人崇拜的神話。

索忍尼辛出走後，一直以「反共先知」的形象遊走於西方世界，並向西方各國提出警訊。他對美、蘇兩國的和解政策，持強烈反對的態度：

⁷⁷ 《Москва 2042》,с.225.

⁷⁸ 《Москва 2042》,с.226.

⁷⁹ 《Москва 2042》,с.346.

「真正的和解，不只是意味著停止戰爭，也意味著在一個國家之內，對人民終止暴力行爲。和解必須建立於堅實的基礎之上，和解的對方必須受到輿論的控制，要有言論自由，要有作為制衡的國會。……現在美國對和解的形式有很多天真的看法，有些人認為蘇聯的領袖已放棄了瘋狂的意識形態。……事實上，蘇聯仍由一小撮領導者所秘密統治，我們怎麼能夠依靠這些人對和解提出來的書面保證？」⁸⁰ 這位反共先知的一席話，果然發揮了影響力；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美國總統福特(Ford)宣布，「和解」一詞不再適用於美國與蘇聯的關係。

索忍尼辛的影響力還可以從各界對他的評論中窺見。一九七四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M.Nixon)在記者面前表示：「我欽佩索忍尼辛的個人勇氣。」⁸¹一九七八年，一位紐約時報的書評稱索忍尼辛是「追隨了偉大傳統的偉大作家」⁸²一九八二年十月，索忍尼辛受邀來台訪問，也有部分人士公開表達對這位反共作家的崇拜之意；當時的輔仁大學教授于衡表示：「在聽索忍尼辛演講的時候，由於深受感動，使我幾次禁不住要流下眼淚！」⁸³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索忍尼辛終於回到睽違已久的莫斯科，這一天，莫斯科市細雨濛濛，但群眾歡迎他的熱情不減。據說，當天的保全人員之多、措施之嚴密，不亞於一九七四年二月將他驅逐出境時所擺下的陣勢⁸⁴。

此外，沃伊諾維奇在《神話背景上的畫像》(Портрет на фоне мифа)中指出，在索忍尼辛身上，可以看見俄羅斯歷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從嘉年華洛夫身上，亦可窺見俄羅斯歷史人物的形象——時而為勝利者喬治，時而為恐怖伊凡(Иван Грозный)。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莫斯科二〇四二》中的嘉年華洛夫，確實是對索忍尼辛的戲擬。

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小說對現實世界中個人崇拜神話的戲擬，展現出狂歡節的精神。《莫斯科二〇四二》透過誇大、滑稽的模擬，嘲笑了史達林個人崇拜神話的荒誕，正如狂歡節廣場上，平民大眾對國王的戲仿與嘲弄。此外，《莫斯科二〇四二》同樣藉由戲擬，諷刺索忍尼辛式的個人崇

⁸⁰ 見註 182，第 262 頁。

⁸¹ 顏元叔 等譯，《索忍尼辛保衛戰》。台北：地球，1974 年，第 182 頁。

⁸² 姚朋，《索忍尼辛與自由中國》。台北：中央日報，1982 年，第 298 頁。

⁸³ 見註 177，第 228 頁。

⁸⁴ 見註 157，第 164 頁。

拜神話，並消解其自許為正統中心的地位。《莫斯科二〇四二》的個人崇拜神話主題表現出離心與反叛的精神，寓有濃厚的狂歡色彩。

